

肯尼迪、赫鲁晓夫  
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美」弗雷德里克·肯普著  
武凤君 汪小英 译



柏林 1961  
BERLIN 1961

FREDERICK KEMPE

# 柏林 1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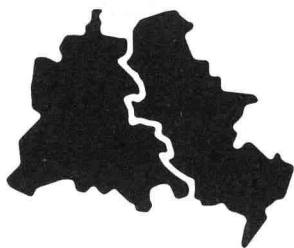
# BERLIN 1961

肯尼迪、赫鲁晓夫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美] 弗雷德里克·肯普 著

武凤君 汪小英 译



(京)新登字 083 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林 1961: 肯尼迪、赫鲁晓夫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 (美) 弗雷德里克·肯普 著; 武凤君 汪小英 译.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12

(历史拼图译丛)

---

ISBN 978-7-5153-2145-5

I. ①柏… II. ①肯… ②武… ③汪… III. ①冷战 - 国际关系史 - 史料 - 研究 - 1961

IV. ①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8238 号

Copyright © 2011 by Frederick Kemp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 Putnam's Sons,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版权登记号: 01-2013-2474

责任编辑: 谢肇文

装帧设计: 后声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420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1/16 710 × 1000

印张: 32

插页: 16

版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55.00 元

---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

当地缘政治格局变迁，我们轻易地忘记了冷战中最恐怖、最危险的一次危机。那时美国和苏联的坦克近在咫尺，剑拔弩张。《柏林 1961》情节紧张，引证丰富，发人深思，为今天提供了诸多教益。

——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这是最好的历史写作。肯普娴熟地剖析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最为重要的一次战略对抗，让我们深刻地理解到冷战的复杂性。

——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真是绝好的一出戏！1961年柏林的对峙是冷战的转折点，远比亚巴导弹危机更为重要，更富启示。这是一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两个魅力型领导人基于误读的碰撞，到今天依然发人深省。肯普引人入胜的叙事是文学与学术结合的典范。

—— 沃尔特·伊萨克森，《富兰克林传》《乔布斯传》作者

弗雷德抓住了一个非凡的故事，这个戏剧性的故事造就了二十八年的世界秩序。《柏林 1961》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在危机四伏、变幻不定和进退两难的当今世界局势中，具有借鉴意义。

—— 查克·哈格尔，美国现任国防部长

弗雷德里克·肯普用生动的描述、机敏的分析以及严谨的研究为冷战中关键而危险的一页提供了新的洞见。他将徘徊在核战边缘的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又带回到我们身边。

——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 序言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

历史学家不断探究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它吸引的强烈关注远远超过了 1961 年的柏林危机，所有的注意都投向了古巴。但是，对于塑造一个时代——自 1945 年二战结束到 1990 年德国统一、1991 年苏联解体的这段岁月，在柏林发生的一切有着更为重要的决定性意义。正是由于 1961 年柏林墙的兴建，标定了冷战双方在其后又持续了三十年的敌对关系，并让我们生活在一些程式化的习惯、做法和疑虑之中。直到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下之时，我们才得到解脱。

再者，这第一次危机带来了尤其强烈的紧张感。威廉·考夫曼是肯尼迪政府的战略专家，在五角大楼研究古巴和柏林。用他的话来说，“柏林是冷战中最危急的时刻。尽管我也深度参与了古巴导弹危机，但我个人认为柏林的处境更加危险，尤其是在柏林墙建成之后，苏联和美国的坦克面对着面，炮口对着炮口，枪口对着枪口。而古巴导弹危机还在发展中我们就能清楚判断出，苏联不会跟美国动真格的。”……

“而你在柏林危机中感觉不到这一点。”

弗雷德里克·肯普大大增进了我们对那个年代的理解。他有给人身临其境之感的记者的叙事技巧，他有政治学家的分析能力，他还有对美国、苏联和德国解密档案的历史学家的剖析，使他能够从独特的角度去洞察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在柏林墙事件背后的作用，而这堵墙象征着冷战双方的对垒。

可惜，历史没有另一种选择。不过，肯普这本重要的著作会督促读者反思有关柏林危机的重要问题，对美国总统的决策提出严重的质疑。

如果约翰·肯尼迪以另一种方式与赫鲁晓夫相处，冷战会不会提前结束？在肯尼迪刚刚上任时，赫鲁晓夫释放了俘获的美国飞行员，不带删减地在苏联报纸上全文发表了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减少了苏联对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之声的干扰，肯尼迪是否充分察觉出赫鲁晓夫的种种和解的姿态？在1961年6月的维也纳峰会上，如果肯尼迪能以另一种态度应对赫鲁晓夫，这位苏联领导人在两个月后宣布关闭柏林边境之时会稍稍迟疑片刻吗？

或者，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样，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肯尼迪默许1961年8月共产党建立柏林墙，乃是危机中下策中的上策？肯尼迪有句名言，与其要一场战争，他宁可要一堵墙。他有理由相信，他面临的正是这样的选择。

这些问题并非无关紧要。

肯普扣人心弦的叙述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西方会不会以一种比现在更为细致的眼光来回顾冷战。冷战不只是对意图称霸世界的苏联的平衡，还是起因于一系列对于对方意图的误会，这些误会在自我暗示中不断加强。看了美苏双方在1961年紧要关头的种种误会，人们会想，如果对于对手行为所基于的国家、经济、政治因素了解得清楚一些，事情的结果也许会好一些。

这些只是猜想，没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不过，由《柏林1961》引发的问题，不但能帮我们梳理过去，也可为我们未来的道路助力。书中的篇章恰好为第一任期的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提供了启示和警示。这位既年轻又相对缺乏经验的总指挥像肯尼迪一样，带着一份外交日程表，旨在如何更加巧妙地与对手周旋，如何更加深入地理解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争端，从而找到化解之道。

在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打交道的年代，我是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亲身经历过这些问题和挑战。

布什和里根这两任美国总统都需要对付戈尔巴乔夫。虽然他们两人迥然不同，却都懂得把结束同苏联的冷战、而不是与苏联恋战放在第一位。

里根总统虽然给苏联贴上“邪恶帝国”的标签，但仍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五次高峰会谈，一同制定出无数的具体协议，正是这些协议建立了两国彼此的信任。当1989年柏林墙倒下，我们致力于德国的统一时，老布什总统既不幸灾乐祸也不捶胸顿足。他不断传递出两方都会因冷战结束而获益的信息。在公开讲话中他保持中立，避免了将话柄授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敌，使他们借机推翻他的政策，革除他的职位。

人们尽可以想象，在1961年的柏林，一个更加强悍或是更加温和的肯尼迪应当能改变历史。但无可争议的一点是那一年发生的事将冷战带回了寒冷的冰窟，而此前，赫鲁晓夫刚刚推翻了斯大林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解冻的最初的机会。

《柏林1961》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带我们重游历史，探索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本质属性、两国国内的政治环境、领导人的个性在事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将所有因素编织进讲述这些因素如何在东德与西德发挥作用的故事中。

这本书引人入胜、引证丰富、发人深省。以多事的柏林为背景，捕捉时代的跌宕，在讲述冷战最重要的几年中挑战着常规的看法。

# 引子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谁拥有了柏林，谁就拥有了德国，谁控制了德国，  
谁就控制了欧洲。

—— 弗拉基米尔·列宁引述卡尔·马克思

柏林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苏联想要在它最软弱的部位动一个手术，除掉这个溃疡，这个心腹之患。

—— 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理对肯尼迪总统说  
维也纳峰会，1961年6月

## 查理检查站，柏林

1961年10月27日，星期五，晚9:00

这是冷战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在危机四伏的黑夜里，柏林人顶着细雨聚集在通往查理检查站的狭窄街道上。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对人数的估计是五百人左右。考虑到他们有可能见证一场热核战争的第一声枪响，这个人数已经不少了。六天以来，紧张不断升级。美国的M48巴顿坦克和苏联的T-72坦克对峙着，相隔着扔一颗石子即可击中的距离。对峙双方各有十辆坦克，另有二十余辆在附近待命。

打着雨伞、穿着帽衫的人群冒雨往前挤，希望找到一个好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弗里德里希大街、莫尔大街和齐默大街的交汇处。那里就是柏林最主要的东西分界点，盟军、平民和车辆都要从此通过。一些人站在房



顶上，另一些人，包括新闻摄影师和记者从低矮的公寓窗口探出身来，这些楼还留着二战时轰炸的痕迹。

在现场直播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丹尼尔·肖尔用颇富权威的男中音绘声绘色地对听众宣布：“今晚，冷战开始了新的一章，美苏两方的士兵在历史上头一次列阵对峙。在此之前，东西方的冲突只是间接地通过他方代理人进行，比如德国人。而今，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对阵，苏联的坦克对着美国的巴顿，只隔着不到一百码……”

形势极为紧张，以至于一架观察战场的美国直升机低飞经过时，一名东德警察紧张地大喊：“卧倒！”一群人顺从地扑倒在地。有的时候，场面奇怪地安静。肖尔说：“这种场面真是怪异，不可思议。美国兵站在坦克边用餐具吃饭，西德人在警戒线后面看着，还有人在买咸面包棒，这一切被东德的探照灯照得如同白昼，而东边的苏联坦克在暗处几乎完全不可见。”

人群中流言四起：柏林要打仗了，“凌晨三点就要开打”。一家西德电台报道，肯尼迪总统在柏林的新任特别代表——退休的卢修斯·克雷将军正像好莱坞电影那样耀武扬威地奔赴东西边界，亲自指挥打响第一枪。另有传言说，是查理检查站的美国宪兵司令打了东德的司令，双方就盼着开战。也有消息说，苏联的全部军队正开往柏林，要彻底结束这里的自由。柏林人就是这样，即使情形再糟糕，也总是喜欢流言蜚语。人群中的绝大多数没有经历过两次也至少历过了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觉得什么事都会发生。

1948年，克雷曾经指挥美国的空中运输，解救了被苏军围困300多天的西柏林<sup>①</sup>。他因为一件事发动了双方这一次的对峙，而他在华盛顿的上级却不觉得这件事大到足以引起战事：东德警察打破了四国协议，要求盟军一方的平民在进入柏林的苏占区之前出示身份证件。而此前，他们只需要看汽车牌照就可以了。

---

<sup>①</sup> 在1948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斯大林封锁了西德通向柏林的水陆通道，但美国通过空运向西柏林运输粮食和日用品，打破了封锁。——译者注

克雷的个人经历告诉他，如不在最小的事情上锱铢必较，苏联会把西方的权利一点点蚕食掉。他因此拒绝合作，下令武装护送平民车辆通过。当车辆通过检查站红白条的水泥隔离墩时，美国士兵们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在两旁护卫，后边跟着美国坦克。

起初，克雷的强势赢了。东德边境的警察让步了。可是很快，赫鲁晓夫就命令他的坦克与美国坦克一对一，如有必要，再升级事态。赫鲁晓夫奇怪地想隐藏身份，可惜并不成功，他下令把坦克上的苏联标识掩去，坦克手穿着没有标识的黑色服装。

那天下午，苏联的坦克开上查理检查站阻挡克雷的行动，一场无足轻重的边界纷争变成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精神战争。美苏两方指挥官在柏林两头的紧急指挥所中指挥，一边等待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的指示，一边考虑着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纽约和华盛顿的领导人正在权衡之际，托马斯·泰里少校率领着美国坦克紧张地估量着这条世界闻名的东西分界线另一边的情况。在1961年8月13日，也就是两个半月之前，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夜间行动：由苏联支持的东德军队，沿着西柏林110英里边界，匆匆建起最早的一道铁丝网和哨卡，目的在于拦截东德人出逃。他们的出逃威胁着共产主义国家的存续。

自那以后，共产主义世界不断加固这道防线，为它添加了水泥隔离墩、砂浆、坦克陷阱、瞭望塔和警犬。对于这道闻名于世界的柏林墙，美国共同广播网的柏林记者诺曼·格尔伯形容为：“有史以来最惊人、最鲁莽的城市改建计划。它像蛇一样蜿蜒穿过城区，通向一场噩梦。”记者、新闻摄影师、政治领袖、间谍头子、将军和游客都蜂拥至柏林，目击温斯顿·丘吉尔比喻的“铁幕”显出真容。

大家都清楚，在查理检查站，双方上演的坦克对阵并非演练。那天早上，泰里少校要求他的坦克炮弹上膛，机关枪上了一半弹夹。除此之外，泰里的手下还在好几辆坦克前安装了推土机铲。对于这一刻，泰里平日里早有准备。他训练部队和平地通过查理检查站——这是四国协议允许的，如果共产党胆敢有所动作，他们就在返回途中推倒在建的柏林墙。

为了取暖加之稳定情绪，美国坦克手把坦克引擎打开，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其实这支只有 6500 名美国士兵的 12000 人的盟军小部队，在一场常规战斗中，相对于离柏林很近的 350000 人的苏军，是毫无胜算的。泰里的人明白，他们是一场大战的导火索。你还来不及说再见，核战就会爆发。

路透社记者亚当·凯勒特-朗匆忙赶到查理检查站，抢发两军决战的最早消息。他看到一名非裔美国士兵紧张地把守着坦克上的机关枪，不禁担心：“他的手一抖，枪就会走火，因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柏林的午夜，正是华盛顿晚上六点，肯尼迪的高级安全顾问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厅紧急开会。总统越来越怕事态失控。肯尼迪的核战略专家确定了在必要时首先向苏联进行核打击的详细计划，先发制人确保摧毁对手，让它无力还击。总统还未签署这一计划，正在向专家组提出疑问。总统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和美国其他一些重要官员坐在一起，末日的氛围笼罩在他的心头。

他们把电话打到西柏林地图室，与克雷将军通话。有人告诉克雷邦迪来电，所以他在听到肯尼迪本人的声音时，吃了一惊。

克雷大声说：“你好，总统先生！”嘈杂的指挥中心立即安静了下来。

“这边的事情怎么样了？”肯尼迪问道，在声音上强作冷静。

克雷报告说，一切尽在控制之中。他说：“我们在查理检查站有 10 辆坦克，俄国人也有 10 辆，我们旗鼓相当。”

助手这时交给克雷一张字条。

“总统先生，我要更改一下刚才的数字，俄国人又增派了 20 辆坦克，这是我们在柏林全部坦克的数量。所以我们也要增加剩下的 20 辆。不用担心，总统先生，他们在跟我们比坦克数量，我更加肯定他们不会怎么样。”

总统先生也会加法。要是俄国进一步增加坦克数量，克雷就无力招架了。肯尼迪扫视了一眼会议厅内焦急的面孔，把双脚跷到桌面上，向担心事情失去控制的人们传达某种放宽心的信息。

总统对克雷说：“好的，保持冷静。”

克雷以他典型的坦率回答：“我们不担心自己会紧张，倒是担心你们华盛顿那边会紧张。”

柏林墙在肯尼迪上任第一年建成，从那时起，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可是，直到现在，我们才有了足够远的距离去观察那些个人回忆、口述历史，以及美国、德国和俄罗斯刚刚开放的秘密档案。了解到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我们才能够更加自信地讲述 1961 年的历史事件。像大多数历史剧一样，这类故事应当围绕时间（编年）、地点（柏林和决定了它命运的其他国家）和特定人物来讲述。

那个时代没有哪两位头号领袖的关系比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更加令人神经紧张了，二人性格反差如此之大，又各有相互抵牾的雄心和抱负。

肯尼迪声称要“让美国再次前进”，赢得了美国 1916 年以来最激烈的大选，在 1961 年 1 月，走入了世界政治舞台，接替连任两届的共和党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指责他让苏联共产主义在经济和军事上都领先于美国。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出身权贵的 43 岁的美国之子。他父亲是一位野心勃勃的超级富豪，但最宠爱的儿子小约瑟夫·肯尼迪死于战争。新总统虽然英俊潇洒、富有领袖魅力、口才超群，可是却患有肾上腺功能减退的阿狄森病，战时负伤又给他遗留下常常发作的剧烈的背痛。他表面上信心十足，可实际上没有把握对付苏联，被弄得焦头烂额。他决心当一位伟大的总统，像林肯和罗斯福那样。可是他却担心，他们只是靠战争才名留青史，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战争意味着核毁灭。

美国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往往是灾难性的。当全球危机的重担从一届政府转移给下一届，比肯尼迪更有经验的人也逃不过这个规律。肯尼迪上任之初的五个月就惹出很多麻烦，从猪湾事件到维也纳峰会的失败。据他自己的叙述，在维也纳峰会上，赫鲁晓夫完全压倒他控制了局面。没有什么地方比柏林更加关键了，那里是美苏两国擂台的中心。

由于脾气秉性，也由于出身，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完全迥异。身为农奴的孙子，矿工的儿子，67 岁的赫鲁晓夫鲁莽冲动，而肯尼迪却优柔寡断；赫鲁晓夫爱虚张声势，而肯尼迪却步步小心。他的情绪不是在波峰就是在

低谷，因为二十来岁才识字，他有严重的不安全感；而在权力的路途中，他克服重重障碍，众多对手或被清洗或被杀害，又使得他无比自信。他和他的导师斯大林是同谋共犯，但斯大林死后他宣布与之决裂。1961年，赫鲁晓夫在两条道路间摇摆不定，他本心想要改革，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而他又习惯了独裁与对抗。他相信通过与西方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可以增进苏联的利益。可是同时，有越来越大的压力逼迫他与华盛顿的关系紧张升级，因为他需要采取一切措施阻止难民外流，否则会引起东德的崩溃。

在东德建立之时的1949年到1961年之间，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作为难民逃离，总共有280万人。如果加上1945年至1949年期间逃出苏占有区的，离开的人数则多达400万。难民潮让这个国家最有才能、最活跃的人口趋于枯竭。

另外，1961年伊始，赫鲁晓夫加快了步伐，开始与时间赛跑。他面临10月就要召开的重要的共产党大会，假如他不能解决柏林问题，在这个大会上，他有理由担心政敌会把他赶下台去。在维也纳峰会上，赫鲁晓夫告诉肯尼迪柏林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他想说那里是最容易触发超级大国间核战争的地方，但除此之外赫鲁晓夫知道，如果柏林的事弄砸了，他在莫斯科的对手一定会置他于死地。

作为这场危机中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重要配角的是来自两个阵营的德国人。他们之间斗争紧张，但不对称。一边是瓦尔特·乌布利希和他1700万人口的日渐衰落的东德，一边是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他6000万人口的经济迅速增长的西德。

乌布利希，与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相比，这一年对他更是生死存亡。东德——所谓的民主德国是他一生的心血。在他67岁时，他知道，没有激烈的改变，这个国家就会走向经济和政治的崩溃。危险越大，他避免危险的手段就越发激烈。而乌布利希的国家越不稳定，他在莫斯科的分量就越重，因为克里姆林宫担心东德的失败会波及苏联帝国的政局。

在边界对面的西德，这个国家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已经85岁。已连任三届的他在向自己的寿命和他的政敌——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宣战。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9月份大选中

掌权，而阿登纳完全不能接受左派掌权。可是，阿登纳认为他的遗产——一个自由民主的西德的最大威胁却是肯尼迪。

到了1961年，西德凭着从纳粹德国的劫灰中凤凰涅槃，阿登纳的历史地位似乎已经确立。可是，肯尼迪却认为他不再重要，而前任的美国总统们则对他过于倚重，牺牲了与莫斯科建立更加密切关系的机会。而阿登纳却担心肯尼迪缺乏骨气和个性，不能在他坚信的关键一年挺身而出，抵抗苏联。

《柏林1961》的叙述分三个部分。

上篇“棋手”介绍了四位主人公：赫鲁晓夫、肯尼迪、乌布利希和阿登纳。在这一年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是柏林，是这个城市在他们的野心和恐惧中所扮演的角色。前几章交代了他们竞争的动机和事件，给后来的剧情发展设定了背景。在林肯卧房醒来的第一个早上，肯尼迪就获得了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的释放美国侦察机飞行员的消息。从此之后，事情就在两位领导人的较量和误解下发展。同时，乌布利希在幕后推动赫鲁晓夫对柏林采取积极措施，而阿登纳则与一位他不信任的美国新总统同船掌舵。

中篇“暴雨将至”。美国在猪湾事件中颠覆卡斯特罗的企图没有得逞，肯尼迪焦头烂额。他看准机会，要通过扩展军备和与赫鲁晓夫的会晤来恢复受挫的外交政策。东德大幅增加的逃离狂潮加剧了乌布利希的危机，他加紧了封闭柏林边界的计划。反复无常的赫鲁晓夫一改大献殷勤的做法，在维也纳峰会上连连打击肯尼迪。峰会上，他重新提出了一个威胁性的最后通牒，并对对手的优柔寡断表示出讥讽和轻蔑。会后肯尼迪黯然离开，对于自己的表现十分泄气，因此更加急于找机会证实赫鲁晓夫对美国决心的误解不会威胁到世界局势。

“对峙”是本书的下篇，也是最后的部分。下篇记录和描述了华盛顿的犹豫不决和莫斯科的最后决定。这一决定导致了8月13日夜令人震惊的关闭边界的行动，以及后来戏剧性的结果。私下里，肯尼迪对苏联的行为感到释然，希望一旦解决了东德难民问题，苏联就会缓和下来。可是，他很快明白了自己过高估计了柏林墙的好处。几十个东柏林人拼命想办法逃离，一些人因此丧生。在国际上，随着华盛顿就如何打赢核战争辩论得

如火如荼，危机也在步步加剧。莫斯科出动了坦克，让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在一年以后、1961年柏林的余波导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这样的情景再次出现。

穿插点缀在讲述中的是一些柏林人的小故事。他们在冷战的关键时刻被不情愿地卷入历史。这里面有数次遭到苏联人强奸的人，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而人们却只想忘记；有反对集体化的农民，他最后被关进监狱；有逃到西德的工程师，她最后成为了环球小姐；有越过铁丝网奔向自由的东德士兵，他在跨越瞬间扔下步枪的画面成为了自由的符号；还有游泳逃跑的裁缝，他遭到枪击，成为东德对逃跑者下开枪令后第一位牺牲者。

早在1961，人们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政权会建立起一道墙来围困它的人民。而28年后，同样匪夷所思，同样一道墙会和平地倒下，似乎只在一夜之间。

只有回到柏林墙筑起的那一年，重新审视相关的势力和人，才能恰当地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理清一些历史上重大的未解之谜。

历史是否应当承认，柏林墙是肯尼迪冷静处理的正面结果，成功地避免了战争？抑或认为，这道墙是他的软弱导致的不幸结果？关闭柏林边界是否使肯尼迪感到意外？或者他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甚至希望如此——因为他相信这将缓和导致核冲突的紧张？肯尼迪的动机是否明智，会催生和平，或只是犬儒和短视，而与此截然不同的做法会挽救数千万东欧人，使他们免受苏联又一代的占领和压迫？

美国大选后，赫鲁晓夫向肯尼迪伸出手，真心地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只是美国没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吗？抑或他只是个反复无常、不足与谋的领导人？如果赫鲁晓夫确信肯尼迪会反抗，他是否会放弃修建柏林墙的计划？难民潮真的让东德危急到了他不惜开战以阻止难民的程度？

此后的篇章建立在新证据和新观点上，试图提供一些新鲜的见解来解释在20世纪下半叶最富戏剧性的一年中所发生的事——希望身处不平静的21世纪初年的我们能享其教益。



双城记之西柏林：选帝侯大街的夜生活。（USIS/National Archives）



序言	001
引子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004



## 上篇 · 棋手

第一章	赫鲁晓夫：左右为难的共产主义者	002
	玛尔塔·希勒斯被强奸的故事	012
第二章	赫鲁晓夫：柏林危机初露端倪	017
第三章	新总统的课程	045
	寒风中走来的“狙击手”	062
第四章	肯尼迪：第一次失误	065